

“母性思维”与当代中国家庭教育中的关怀叙事

尼莎

(河北经贸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61)

[摘要] 关怀伦理学主张从母性实践出发,在与子女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中给予子女保护性的爱,对子女进行精神上的教养,帮助子女形成社会化人格等,文章以关怀伦理学中的母性思维为视角,以池莉等作家依据自身母性实践创作的关怀叙事作品为例,与柏杨、余华等人作品中父职角色在家庭中充当道德权威的书写对比,探讨了“母性思维”观念对于当代中国家庭教育的积极意义,即促进家庭中亲密关系和信赖关系的产生,同时父职身份也应该受到“母性思维”观念的影响相应地进行转化,从道德权威转变为道德关怀。

[关键词] 母性思维;母性实践;关怀伦理;家庭教育;池莉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23.04.012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23)04-0082-07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女性的地位得到了极大解放,女性在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同时,依然是家庭稳定的重要保障者和对子女进行教育的主要承担者与实施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重发挥妇女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1]37}。家庭教育是妇女发挥在家庭生活中重要作用的一环,本文通过从关怀伦理学中“母性思维”视角分析当代中国的家庭教育叙事,重申当代家庭教育中建立亲密关系的重要意义,有助于深化人们对家庭教育中母职角色的重要性与父职身份转变必要性的认识。

一、母性体验与“母性思维”

古往今来,面对卷帙浩繁的文献大书特书于伟大的母爱时,我们不免要问,是否存在一种生物学上的母性“本能”,使一位女性自她成为母亲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倾注全身心的关爱,随时准备为子女献出一切?在存在主义女性主义者波伏瓦看来,不存在母性的“本能”:一位母亲依据其所处的整体环境与自身能够承受的方式决定她的态度,因此母性是多种多样的。

波伏瓦是从反对性别本质论的角度提出这一论

断的。她通过分析柯莱特·奥德里、索菲亚·托尔斯泰、凯·曼斯菲尔德等人的作品,分析这些女性在成为母亲及担负母职过程中的喜悦、幸福、冷淡、惶恐,以及犹豫不决等心理活动后指出,一位母亲同孩子们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其生活的整体形式,并同其与婚姻伴侣、过往经历、自我思虑关系密切,而并非仅取决于生育孩子本身。但波伏瓦并未否认母爱的崇高与作为母亲的德性,在她看来,母爱的德性在于不求回应的关怀——“在女性面前的不是一个男人、一个英雄、一个半神,而是淹没在脆弱的、偶然的身体中牙牙学语的微小意识;孩子不掌握任何价值,他什么也不能给予;女人面对他时自身仍然是孤单的;她不期待任何针对她付出所带来的具有交换性质的补偿性回报;她自己的自由会为她的付出赋予价值和理由。”^{[2]342}与此同时,波伏瓦也引用精神病科医生海伦妮·多伊奇的研究指出,母职是一种非常崇高的职能,女性正是由母爱达成自我的完全实现,且这一实现要以她自由、自愿并且真诚地承担职责为条件。“只有平衡的、健康的、意识到自己责任的女人,才能够变成一个‘好母亲’”。^{[2]354}从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将波伏瓦对于母性关怀的伦理要求概括为真诚、自愿、利他及责任。

与波伏瓦的观点遥相呼应并有所拓展的,是英

[投稿日期] 2023-08-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课题(编号:22BZX072);2022年度河北省新型智库“河北省道德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科研专项课题(编号:2022ZKYB001)

[作者简介] 尼莎(1986-),女,河北石家庄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伦理学,思想政治教育。

国女性作家蕾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在近作《成为母亲:一名知识女性的自白》(*A Life's Work: On Becoming a Mother*)中的母性体验。卡斯克指出,怀孕生产后,女人对于存在意义的体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作者看来,一个成为母亲的人几乎无法被人传达做母亲是怎样的一种体验,这种体验在各个文化间都难以解释。但这种独特的体验,没有做过母亲的人是无论如何都体验不到的。甚至在书中,卡斯克被“我是否爱自己的孩子”这一问题折磨,并如实地记录了自己在照料孩子的过程中险些失控的经历。作者将女儿哭泣声的停止作为一种隐喻,象征她已熬过了生存所带来的首次痛苦,并从中锤炼了自己。“她也锤炼了我”,作者写道,“我虽没帮助她,也无法理解她,但一直陪着她。我突然确信,这便是母性。”陪伴就意味着一切。“因为陪在她身边意味着不去别处,准备好放弃一切。”^{[3]64-65}从卡斯基基于自身经验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亲密关系对于母性实践的重要性。

就母性关怀或母性实践来说,波伏瓦和卡斯克虽然都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但并未提出系统性的理论,关怀伦理学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问题。“母性思维”(maternal thinking)是美国当代哲学和妇女学教授萨拉·拉迪克(Sara Ruddick)对于发展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的一种尝试,也是其自身思考、关怀和抚养子女的实践活动而得出的规范性主张。这种实践活动是关于保护和教养子女成长,以及将他们培育成为社会行为人的过程。拉迪克指出,母性实践者“在对孩子的要求作出回应的过程中获得的一种概念性结构,亦即相互关联的词汇与能力。母性实践者通过这一结构组织和表达自己实践的事实与价值,与之同时存在的还有一种反思、判断和情感上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即称作‘母性思维’”^{[4]342-367}。在这一过程中,母亲们及承担母职的人们提出一些问题,寻求答案并建构起相应的认知方式和价值观念。在拉迪克看来,母性思考来源于母亲的三种实践活动。首先,母亲需要对孩子进行保护性的爱,也就是母爱。但母爱并不是天然自发和取之不尽的,为了抵消母亲们对自己身份的失望和情绪逃避,拉迪克认为必须培养起三种能力和美德,即监护、谦恭和快乐,并使其作为自己的精神习惯与认知方式。其次,母亲们需要对孩子进行精神上的教养以促使其成长。拉迪克总结了母性思考在实践中的三种

方式,即接受符合自然天性的情感和行为,欢迎孩子成长所带来的变化,以及对具体问题的思考。“也就是丰富复杂性,容忍模糊性和增加选择性,而不要仅仅去接受问题的概念。”^{[5]93}再次,母亲们要对自己的孩子进行培育,使自己的孩子社会化,帮助他们成为合格的公民。拉迪克指出的母亲们为建立起身份认同所应培养的三种美德能够产生更多的价值。监护产生责任,谦恭带来包容和同情,快乐则更利于分享。可以看出,这一理论的核心问题在于母亲及承担母职的人在抚养子女的过程中,如何产生母性关怀的思考方式。

二、当代中国家庭教育中的母性关怀叙事

在家庭教育中运用“母性思维”有助于亲子之间亲密的关怀关系的养成。虽然关怀伦理学及其所内涵的“母性思维”理论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但许多母亲在家庭教育中已自发地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母性思维”理念。我们可以从当代女性作家依据自身母性经验书写的作品中暂作一窥。

就当代中国家庭教育中的母性关怀叙事而言,池莉的作品具有极大的代表性。其作品中多题材、多体裁、多篇幅地大量书写了真实动人且感人至深的母亲形象,它们可以作为新世纪中国女性作家母性关怀书写的很好例证。在这些作品中,池莉结合自身的母性经验所写的三部纪传性质的长篇散文《怎么爱你也不够》(2000版)、《来吧,孩子》(2008版)、《立》(2013版),以时间为线索,由女儿不同时期的成长轨迹记录而成,三部作品时间间隔性虽大,但关联性和延续性却极强,从一位母亲的视角叙写了自己从怀孕到生产再到养育女儿的过程中所有的经历,以及作为母亲陪伴女儿出生、成长及至成人过程中的点滴成就与辛酸,我们可以从其家庭教育的关怀叙事中把握其母性实践的展开方式。

(一)基于自然关怀的伦理义务

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男性也会对自己的孩子投注关怀,也会在某些情况下负担起母性角色的职责和工作。但无法否认的是,成为母亲的生理体验是独属于女性所有的。作为母亲和描述者,在散文《怎么爱你也不够》中,池莉真诚地将自己身为人母的情感体验表达出来,记录了怀孕时,初为人母时的感受,以及自己同丈夫在这种感觉上的差异。

“我怀孕了。我一路上小心翼翼地走着,向所有行人微微含笑,心中柔情似水。我想那天即便天塌下来了我也会面不改色心不跳。我深深体会到了身为女人的幸福,我是多么地感谢我的孩子,在她生命初绽之时便为我带来这幸福的感觉。晚上,我试图把心底的幸福感转达给我丈夫,他却一味傻笑。他也万分高兴,又说又笑,可他体验不到那种特殊的幸福,可怜的男人。我这才明白苍天是多么公平。”^{[6]256}

体验过这一独特的幸福之后,母亲的身份使作家对于生活和奋斗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池莉将为孩子所做出的努力和妥协,以及无论是非正误的观念的转变都如实地记录下来。在生产前的一个月,想到女儿未来可能因为自己缺乏奶水而需要奶粉,池莉决定赚一笔稿费作预备。为了防止奶水短缺对孩子造成的可能的伤害,因怀孕体型臃肿无法坐在桌前的女作家,在仅能站立的情况下用时十几天完成了中篇小说《不谈爱情》。作家坦承这是她首次以赚钱为目的的写作,然而内心深处却十分地安详和堂皇,并无任何亵渎文学之感^{[6]262}。

如前所述,对于何为母爱,母性如何确切表达的问题,许多女性写作者都表现出困惑。作者也将这种难于表达的困惑真诚地表达出来。

“什么是母爱?当我没有孩子的时候,我以为我知道。那是一种无微不至的照料,一种不讲原则的宽容。我曾在小说中多次描写母爱,读者反映说写得挺像,我还无不得意。当我怀孕的时候,我更认为我懂了,认为那就是巴望得不得了,思念得不得了。一旦我把女儿抱在怀里,我反而茫然了。我搜肠刮肚,想有一种爱的表达方式,可就是没有。我惶惑地面对女儿,生怕抱她的姿势不对头使她不舒服,亲她怕亲坏了她,惊动了她。看她怎么也看不够。总觉得如此精致的一个小人儿,我该拿什么奉献给她呢?”^{[6]281}

在这篇从怀孕到女儿五岁的长篇散文中,池莉以非常细腻的笔致写出了伴随女儿成长脚步而不断调整的理性而深挚的母爱,以及自己对于母亲这一身份的欣喜和感激。情感虽然真挚,只是在文中,作者写自己身为母亲的坚强和脆弱,写和丈夫的争吵、与保姆的周旋,但却从不涉笔孩子为自己带来的负面情绪。这难免令人好奇,在养育的过程中,女儿是否从未给作者带来过负面情绪?正如前文中波伏瓦和卡斯克等人所描述的,人的情绪是存在两面性的,

当一个母亲享受孩子为自己带来的幸福时,她也部分地承受了孩子带来的痛苦,哪怕这些痛苦和幸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二) 教养孩子为社会所接受的责任

作为孩子最初的也是最亲密的伙伴,对于子女的关怀是母性实践的重要维度。对于如何教育女儿这一点,作者自承担母职之日起便持续不断地思考。同龄人大多为到了读幼儿园的年纪的孩子选择各种兴趣班与补习班,池莉对此持不同意见。对于孩子的早期教育,池莉坚持从人的本性出发,鼓励女儿和她的朋友们尽情地相处和游戏,令她在最为欢乐开放的环境中接受自然的启蒙;同时也通过阅读和讲故事的方式对孩子进行教育。^{[7]70-71}在女儿小学阶段,池莉也坚决捍卫着女儿的快乐生活,升入高中后,高考大战一触即发,不满于就读学校教育的做法,母女共同作出转入英国名校 C. C 中学就读高中的决定。在 C. C 中学,女儿优异的表现获得了两任校长的赞誉,池莉也把这种欣喜通过文字传达出来,谈及她这么做的初衷,池莉说:

“秀孩子与夸孩子,是在自己挠腋窝的痒痒——自己特舒服,别人看着不雅。我的《立》,不秀也不夸,只是恨教育。现在对孩子的教育与食品一样含毒太多,我是母亲,我要抵抗,就这么简单。”^[8]

成年后的女儿已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顺利获得硕士学位,独立地踏入社会。作为母亲,池莉与之一样庆幸开心,甚至更有过之:“我们做对了”“终于扛住了当下的教育”。

在女儿成长过程中,道德教育是作为母亲不可缺少的一环。在女儿早年的成长过程中,有两位老师对她影响巨大,一位是帮助她树立起艺术品位的钢琴老师,还有一位是在女儿小学升初中关键时刻帮助她补习的数学老师。在女儿获得成功后,池莉提醒要将懂得感恩作为一种美德内化于心。

“一个人的高尚德行是超越尘世繁华和形式美的心灵光芒,这光芒像太阳一样存在于他们的内心,使他们明亮而美好,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人的美与物的美是不一样的,人的美需要心里有美德的光芒。”

“亦池你从小认识过的人,现在是不是已经忘记了很多很多。”

“是的妈妈。”

‘你会忘记这两位老师吗?’

‘怎么可能呢妈妈!’

‘是啊!孩子,记住他们,懂得他们,学习他们,用良好的成绩来报答他们,让他们为自己亲自教授的学生自豪,那是老师最有价值感的东西’。”^{[9]97}

在中国传统教育伦理视角下,所谓“育善”,一方面是事业所需的善知识、善技艺,即可靠而优良的知识及技艺的教导、培育和训练。另一方面是从事该事业所必须的善规矩、善德行的教导、培育和训练。^{[10]33-39}这一教育活动通常由教师来完成,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母职人员在教养子女中的重要角色更是不容忽视的。此外,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在作者的写作中也存在一些并不中立的叙述。比如作为在读高中生,在没有知会学校的情况下申请外国高中,这种做法有可能影响备考期没有其他选择的同班同学的心态。在紧张的备考和升学压力下,为了稳定大多数学生情绪,学校撤掉其课桌的做法并不能简单地视作不正义。中国高考虽然严酷,但却是一场绝对公平的竞赛。作为打通整个社会阶层流动的方式和渠道,它的过程不可能是一派轻松与祥和的。因此可以说,池莉对于中国现行教育的观点,最大的意义不在于观点本身,而在于从一位母亲的角度,对现行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作出了一定的质疑和反思,这份质疑中既有母性实践中的关怀情感,也有当代女性作者在公共领域中发声的社会责任意识。

(三) 母亲与子女双向成长的责任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国内批评界开始质疑女性在传统社会中的母职角色是否是必要的担当,以及这一规范性母职角色背后暗藏着怎样的性别压迫问题。比如孙绍就提出将生理性别与文化性别区分开来的主张^{[11]96}。孟悦、戴锦华同样指出,传统社会对于母职的倡导在后期发展成为一种文化禁锢,这种禁锢使“做母亲”成为唯一的最适于女性的职业和荣耀。而女性自身的情感、事业乃至性需求则完全被履行“母亲”这一职责所需要的自我牺牲和母爱想象遮蔽了^{[12]235}。而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女性生育功能蕴藏着强大的性别伟力,这种力量不是对抽象母爱的盛赞,而是从女性主体选择的文化价值角度出发的一种自我发现。因而21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中,更多的是将女性的身体经验赞誉为独属于女性的生命创造力,这

种创造力使得女性具有了男性无法拥有的精神伟力^{[13]137}。本文赞同后者观点,事实上,当一个群体为了获得某种社会权力而刻意忽视自然赋予自己的天赋与职责时,他们很难称得上是一群应当享有权利的完全责任人。母性职责便是自然赋予女性的权力与职责,一位成熟的母亲,应当在关爱孩子与关爱自身之间取得平衡,并在这一过程中促进双方共同成长。只有基于自我赋权并保持独立人格的母亲才能在家庭教育中更好地爱孩子和实施更好的家庭教育,并避免制度化母性带来的种种不利处境。

在第二部《来吧,孩子》中,池莉记录了在抚养女儿过程中自己对于母性职责的认识,以及女儿的逐渐成长为自身认知所带来的变化。在她看来,父母,尤其像她对孩子进行亲密看顾的母亲,在事实上一直担负着老师的职责。母亲以何种精神和情志来关怀和教育孩子,孩子就会相应地反馈出何种反应和表现:

“孩子是一个奇迹。许多时候,婴幼儿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得多……在孩子身上的发现,使我这样地敬畏幼小生命。我意识到:关键在于父母!在于与她婴幼儿阶段密切相处的母亲。你得引领和配合孩子,你得让她从小就骄傲地认为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有用之才,并且有能力应对挑战。首先需要好好学习的,原来是我。”^{[9]16}

肖巍认为,女性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无法明确分割,因为“性别一旦成为‘概念’或‘范畴’便永远都摆脱不了社会和文化的内涵,而社会性别也总是基于生物性别才能成立。”^{[14]169}为了证明这一观点,肖巍将“生母”与“慈母”作为探讨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关系的例子,指出“生母”是一种种族繁衍的生育能力,而“慈母”却是一种文化习得。在以家庭教育为中心的三部曲散文中,池莉以慈母形象贯穿文章始终,甚至在作者与丈夫离婚、家庭中严父缺席的情况下,池莉依然维持着一贯的慈母形象。在三部曲散文的最后一部《立》之中,作者坦言自己对女儿是溺爱的:

“对于小亦池的性格弱点,我必须溺爱。我的溺爱不是给钱,不是给零食小吃,就是任何时候都维护她、信任她,尽可能为她营造更多的快乐轻松氛围我必须溺爱我孩子虚弱的地方,我必须以溺爱增强我孩子的软肋,好让她逐渐适应社会,适应竞争社会的环境。”^{[7]70-71}

在肖巍看来,母性思维是母亲或担任母性角色的人在母性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知识判断、价值标准和道德能力^{[15]192}。这种能力并非生而知之的,而需要后天不断地实践和培养。从这一角度出发,母亲也有和子女共同成长的责任,并在教养子女的过程中不断地观察思考,进而形成自身作为母亲的价值观念和道德选择。有评论家认为,三部作品在有些内容上不免重复,但重复的背后明确地表达出一位母亲对孩子无以复加的爱^{[16]230},诚如此言。可以说,池莉从积极饱满的母性体验出发,从真情流露的《怎么爱你也不够》,到在成长中不断飞跃的《来吧,孩子》,再到陪伴孩子成长为独《立》之人,其作品对于重思当代家庭教育及其妇女在其中的角色和地位,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三、“母性思维”视角下父职角色的转向

就“母性思维”这一概念来看,拉迪克是从文化和实践意义上定义母亲的,在她看来,“母亲”是以母性思维进行了母性实践,并对孩子进行保护、教养和培育的人,因此也包括男性。在池莉的三部曲散文中,父亲的形象是弱化甚至消失的,这是由作家的个人经验所致。那么,假设在只能由父亲充当教育者的单亲家庭中,“母性思维”是否能够起到作用呢?在谈到以母性思维重塑家庭生活时,拉迪克曾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提出,不应将“家”简单地理解为父母共同在场的空间,还应有很多方式可以为孩子提供母性关怀,而这些关怀的一个特点是不包含性别在权力和特权(即父权)方面的不平等^{[4]342-367}。池莉的系列作品无疑是对这一说法的有力佐证。但同时,这些作品也令我们发问,一位父亲对于子女的关怀要如何体现才是恰当的?

无疑,无论是女性主义还是关怀伦理学,都无法否认父亲在家庭中应当对子女给予关怀。现实生活中某些情况下,很多父亲在对于子女的关怀和爱护方面甚至超出了不负责任的母亲。然而,如果从普遍性角度看父亲与母亲在子女成长中的关怀方式,会发现父亲对于子女的关怀中会不自觉充当道德权威或训诫者的角色。与此相对,在话语表达上会不自觉带有“训诫—服从”模式。以柏杨在狱中与女儿的通信《柏杨家书》为例,在谈到女儿的课时,柏杨说:

“英文跟数学一样,要靠耐心,不能靠聪明(任何

学问都是如此),你在家最好每天要跟妈妈用英语作简单的对话……爸爸过去写的信,吩咐了一些事情,你看到了吗?照做了吗?来信都要告知。”^{[17]18}

对比柏杨和池莉对女儿书信中的语气和口吻,柏杨无意识的威严和池莉无意识的亲昵形成一种对照。从生物学角度解释,母女二人在母亲的怀孕阶段是一体的,共享同一个身体,感知同样的喜乐悲苦,因此在相处过程中有一种无意识的亲密。就当代男性作家的父职书写来看,当母性角色在家庭中出现缺位时,作家往往倾向于寻找一位女性人物作为母职的替代,而不是使父亲充当母亲的角色。如余华的新作《文城》,从男主人公林祥福(以下简称林)背着襁褓中的女儿林百家南下万里寻妻之日起,女儿的存在就成为林祥福生命的强烈寄托。林对女儿的爱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同女儿间依然存在距离,在女儿成长过程中担任母亲这一角色的是林的友人之妻,当友人一家因故搬走时,女儿最初几天时常独自流泪,“一天她想起了什么,走到林祥福面前,问她母亲是谁。”余华这样描述林祥福的心理活动:

“林祥福吃了一惊,这时才意识到李美莲在女儿心中的位置多么重要,十三年来林百家没有问过母亲是谁,如今李美莲离去了,她才想起自己的母亲。”^{[18]156}

将女儿送去上海的中西女塾是林祥福自己的决定,出于父亲关怀与保护的责任他亲自送女儿赴沪,但女儿直到行至途中依然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要去做什么。

“半个月后,林祥福带上林百家和行李,坐上竹篷小舟来到沈店,又坐上马车前往上海。一路上林祥福都是神情严厉,林百家心里忐忑不安,她不知道要去何处,也不敢询问,她感到陈耀武偷偷来看她的事已被父亲知晓。一直到了上海,来到中西女塾,林百家才知道父亲送她到了什么地方。”^{[18]159}

林百家对于父亲的服从是无意识的,也可以说,林祥福对于林百家的安排与训诫同样无意识,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林祥福对于女儿的关怀。从拉迪克的母性思维所具有的保护、教养和使子女为社会所接受的三要素看,林祥福也在扮演着“母亲”的角色,但身为女儿的林百家依然需要李美莲这一母性身份的存在。由此我们可以对男性和女性在“母性思维”视角下扮演的“母亲”角色作出区分。与身为父亲的男性相比,“母性思维”视角下的女性与子女更易于建

立起亲密和平等的关系。对此拉迪克认为,男性应当对此做出改变,当男性愿意并能够更加平等和积极地建立起与子女的亲密关系时,将不再有“父亲”或“母亲”的称谓,只有照顾孩子的人^{[4]342-367}。

综上所述,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千家万户中的良好家风,是构成社会良性风气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妇女要自己肩负起尊老爱幼、教育子女的责任,在家庭美德建设中发挥作用”^{[1]37}。“母性思维”的核心价值在于分享、包容、同情、责任。“母性思维”视角下的家庭教育,中心内容在于母亲通过保护子女、教养子女为社会所接受,以及通过教育子女构成亲子间的双向成长,能够为建构家庭教育文化新生态提供可能。此种模式下家庭教育的前提在于亲密关系的产生。亲密关系的建立既源自亲子间天然的情感纽带,也来源于母亲在保护与教养子女过程中产生的依恋及信任关系。作为一种情感纽带,亲密关系可以成为亲子间的一种双向投射,父母在成为孩子的情感支撑的同时,亲密性的情感体验也内化于父母的身心之中,为母性实践提供准备。通过池莉等人在当代家庭教育中关怀叙事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母性思维的框架下,充当母职角色的关怀者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母职身份和教养子女过程中的情感体验进行子女教育和自我教育。与此同时,当代家庭教育中的父职角色也应当从公正向关怀进行适度的转变,以此在与子女建立起更为亲密平等的亲子关系过程中,更好地进行家庭教育。

同时也应注意到,虽然关怀伦理学中的“母性思维”对于当今家庭教育的发展有着诸多启发,但其亦存在某些局限性,表现之一在于对子女感恩与反哺之心教育的缺失。感恩反哺之心能够树立起子女内心“敬事”之思,不论从子女自身的成长或与他人社会关系的关联中,“敬事”思想都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母性思维”观念的这种缺失可以在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得到补充。在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母慈子孝”是家庭内部基本的伦理要求。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传统社会母教发达,母亲在教养子女、传承家学方面的影响巨大。中国文化中的母教思想,其哲学基础在于由阴阳相济思想衍生出的“母者,与父同尊”的孝文化道德训诫。与此对应,中国传统伦理中“尊母”“敬母”的孝道观念亦渊源已久。

自先秦时期开始,尊母便与对于母德的讴歌联

系在一起。《诗经·大雅·思齐》中,对于文王先妣的颂扬首先就强调她们美好德行对文王的影响。《列女传》曾记载,太任怀文王时非常注意德育言行,“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及至文王出生之后,“生而明圣,太任教之,以一而识百。”^{[19]131}传统社会对于母亲贤淑德性和善于教子的品质推崇已久,但其教育范围大多尚局限于家庭内部,或借由贵族家庭内部影响社会。近代启蒙思想家宋恕将母教作为振兴国民的重要举措,“人之生也得母气居多,其幼也在母侧居多;故使女人皆读书明理,则人才、风俗必大有转机”^{[20]17}。郑观应继承了宋恕这一观点,称“广育人才,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学校始”^{[20]36}。敬母、孝母被提升到整个社会国家层面。然而在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潮流中,孝道因其对于个体自身个性的压制而受到知识分子集中的批判,由此在其后建立的新道德体系中,孝敬父母虽仍被视为诸种美德之一,但已失去了其作为伦理原则的核心地位。但在今日的家庭教育中,“孝”本身的积极内涵——维持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实现家庭内部协作和和睦、凝聚为一体有效精神纽带的作用却不可忽视^{[21]70}。因此,可以在吸收关怀伦理学“母性思维”观念的同时,发掘中国传统孝道伦理的当代价值,以促进新时代家庭教育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2] 波伏瓦. 第二性[M]. 郑克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 [3] 卡斯克. 成为母亲:一名知识女性的自白[M]. 黄建树,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 [4] RUDDICK S. Maternal Thinking[J]. Feminist Studies, 1980,6(2):342-367.
- [5] RUDDICK S. Maternal Thinking: Toward a Politics of Peace[M]. Beacon Press, 1995.
- [6] 池莉. 池莉文集(第四卷):真实的日子[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 [7] 池莉. 立[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
- [8] 池莉. 我们的教育都让孩子“立”不起来[EB/OL]. 中国作家网(2016-07-04)[2023-07-25]. <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3/2013-05-31/163670.html>.
- [9] 池莉. 来吧,孩子[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 [10] 焦国成. 中国传统教育伦理理念及其主要话语[J]. 江西

- 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1(1):33-39.
- [11]孙绍先.女性主义文学[M].大连: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
- [12]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 [13]陈宁.女性身体观念与当代文学批评[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
- [14]肖巍.织梦:问思新女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
- [15]肖巍.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 [16]黄静.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M].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 [17]柏杨.柏杨家书[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
- [18]余华.文城[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
- [19]陈佳.先秦时期女德研究[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
- [20]刘慧英.女权、启蒙与民族国家话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 [21]姚新中,王水涣.当代中国伦理的变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 [责任编辑 李 新]

Maternal Thinking and Caring Nar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Family Education

NI Sha

(School of Marxism,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Hebei 050061, China)

Abstract: The ethnics of care advocates that children should be provided with protective love, spiritual nurture, and socialized personality through maternal practice in the course of constructing an intimate relation with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ternal thinking in the ethnics of care, this paper takes Chi Li's and other author's caring narrative works on their own experiences as examples. In contrast with the moral authority of fatherhood in the works of Bo Yang, Yu Hua, etc,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maternal thinking in contemporary family education in China. In other words, maternal thinking can booster the intimacy and interdependence among family members; meanwhile, with the influence of maternal thinking, the role of fatherhood should be shifted from moral authority to moral care accordingly.

Key Words: maternal thinking; maternal practice; the ethics of care; family education; Chi Li